

民族宗教研究

Ethnic and Religious Studies (Volumn II)

[第②辑]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 / 编



- ◆ 清代涉藏民刑案件研究与展望
- ◆ 黄埔珠江村蒲氏考
- ◆ 唐宋时期的广东穆斯林社区
- ◆ 广东的原始宗教与民间信仰

广东省出版集团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宗教研究. 第2辑 /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编—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218 - 08493 - 0

I. ①民… II. ①广… III. ①民族学—文集②宗教学—文集
IV. ①C95 - 53②B92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20707 号

MINZU ZONGJIAO YANJIU DI ER JI

民族宗教研究(第2辑) 广东省民族宗教研究院 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曾莹

策 划: 肖风华

责任编辑: 梁茵

封面设计: 邓晓童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8493 - 0

开 本: 889 mm × 1194 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380千

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04 83791487 邮 购: (020) 83781421



目 录

民·族·研·究

清代涉藏民刑案件研究与展望 柏桦 冯志伟 / 3

《卡其帕鲁》及其汉译的价值 问永宁 桑杰顿珠 / 11

黄埔珠江村蒲氏考 黄兆辉 / 21

客家地区传统民居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 ——以粤东围龙屋为重点 肖文评 / 52

闽西客家妇女的点佛仪式 ——以宁化县淮土乡孙坑村的调查为例 钟晋兰 / 61

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以广东乳源瑶族自治县为例 郭正涛 侯阳阳 / 71

广东民族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之思考 盘小梅 / 87

少数民族流动摊贩生存实践调查 ——以广州市为例 张成 / 91

宗·教·研·究

唐宋时期的广东穆斯林社区 马建钊 汪鲸 / 101

客家地区传统民居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

——以粤东围龙屋为重点

肖文评

客家人是由历史上南迁的北方汉人与南方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个颇具特色的汉族民系。在中国地域文化中，客家文化以其民风民俗的古朴而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客家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建造了众多土楼、围龙屋等著名的传统民居建筑。粤东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以梅州为中心分布于粤、闽、赣边界地区的围龙屋，是客家地区最有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它与北京的“四合院”、陕北的“窑洞”、广西的“杆栏式”和云南的“一颗印”并称为中国五大传统民居建筑。围龙屋被研究者称为中国传统社会独一无二的建筑模式，是具有族群性特质的标志性民居建筑。围龙屋是客家地区历史文化长期发展的产物，具有相当深厚而丰富的社会人文内涵。

题引

根据学者研究，唐宋年间定居于粤、闽、赣交界区域的山区和丘陵地带的中原汉人，与当地俚、畲、瑶等土著民族经过长期的互动和融合，至宋明时期彼此在文化上互相涵化，形成了一种既不同于当地原住居民的旧文化，也不完全雷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这种新型文化就是客家文化，其载体就是客家族群，该族群的成员就是客家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看重根的民族，这根的直接表现就是他们的家园。房屋对于他们并不仅

是一个住所，也意味着生命的归宿。而对于客家人，又有特别的意义。谚云：“福佬好食粥，客家好起屋。”客家人的乡土观念特别重，故对于居室建筑，不能不特别讲究。关于客家人的民居建筑观念和建筑样式，客家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教授在1933年出版的《客家研究导论》中说：“经营屋宇，地必求其敞，房间必求其多，厅庭必求其大，墙壁务极整齐。其著名的，往往有钜至内容有房子四五百间，能住男女四五百人；求之其他各地，真不容易看见这类大屋。”“客人屋式，有围龙、棋盘、二字、四角楼、围楼、五栋、枕头杠、茶壶耳等名目，每式以正栋及横屋为主体。正栋或称正厅，制如宫殿，横屋如宫殿的庑。”^①可见，客家传统民居，以类型多样、规模宏大、社会文化内涵深厚、其他地区少见而著称。

据统计，粤东客家地区的传统民居近五万座，不仅数量大、分布普遍，而且种类多，有土楼、围龙屋等各种客家特色民居，因而被称为“客家传统民居的博物馆”。

对于这种颇具特色的传统民居，近年来引起众多学者关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不过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主要以介绍性或“共时性”研究为主，少见“历时性”的研究，尤其是结合地域社会发展脉络的研究，影响了对传统民居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本文结合粤东从宋明到近代近千年的社会发展，探讨各种传统民居形成和发展的背景和社会变迁，以更好地理解粤东客家民居文化的发展脉络，理解客家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及其

肖文评，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① 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1933年希山藏本）本，1992年，第180页。

内涵。本文试从社会变迁角度,探讨客家传统民居的形成与发展变迁。

一、传统民居建筑的主要类型和分布

据学者们调查和研究,粤东客家地区传统民居建筑类型多样,主要有围龙屋、围楼、走马楼、四点金、殿堂式、中西混合式等。^①其中以围龙屋存世最多,也最具特色。

1. 围楼

其建筑形式呈圆柱形、碉堡式,属全封闭式的高大建筑。楼高3~5层,高达10~20米,内径十多米至几十米不等。用黏土、细石、竹料等作为建筑材料,夯成厚达1米以上的圆形外墙,上盖大屋顶的灰瓦,外墙坚固结实。底层不开窗,只有一扇大门出入,安全可靠,免受侵扰。内屋则用木料做楼板和栏杆,楼内各房间前后宽度不一,呈梯形。每座围楼少则六七十间,多达二三百个房间,可供数十户甚至上百户的大家族聚居。围楼主要分布于闽、粤、赣边境山区。据调查,大埔县现存数十座围楼,如大埔县大东的花萼楼、湖寮的泰安楼、枫朗的维新楼等;蕉岭县的南礮镇有石寨土楼等。

2. 走马楼

其外形有一字形、凹形、曲尺形等。多倚山而建,分上下两层,墙基用石砖砌成,墙体用黄土等筑成。底层为厨房、杂间、畜栏等,上层为居室和仓库。其主要特色是在二楼外部用木料建成一条长长的走廊,以适应山区潮湿、多雨的自然环境,既可防山洪,避潮,也可防盗、防野兽,干爽、卫生、通风。如大埔县百侯镇侯北村的保定楼,梅江区三角镇约亭村的加层走马楼“诚创庐”,金山街道办龙丰攀桂坊的“崇庆第”等。

3. 四点金

建筑平面呈四方形,楼高2~3层。主要分布在蕉岭、梅县、丰顺、大埔、五华一带。其主要特点是在房屋的四角,建有如近代炮楼式的高层建筑,楼四角均有瞭望孔和枪眼。如五华县锡坑李惠堂故居、周江照裕楼,蕉岭县新铺镇润谿

堂等。

4. 府第式

即殿堂式风格的民居建筑,采用“抬梁式”和“穿斗式”混合结构,布局严谨,讲究坐向,主次对称。主要特点是屋内厅堂多、天井多,乡村习惯称这种民居为“十厅九井”或“九井十八厅”。代表性的建筑有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的“通议大夫第”、梅县南口侨乡村的“南华又庐”、梅县松口铜琶村谢姓“荣禄第”等。

5. 中西混合式

这是客家侨乡民居建筑形式的一种特殊风格,其特点是将客家传统的房屋结构结合西洋的建筑艺术装饰建造的混合型民居建筑。尽管在外观上吸收了西洋的艺术装饰,而内部仍然是地道的客家民居传统结构。如平面布局左右对称,厅堂天井多等。代表性的建筑有梅县西阳镇的“联芳楼”、程江镇的“万秋楼”,丰顺县黄金乡的“祥耀楼”,大埔县湖寮镇双坑村的“曰庐”等。

6. 围龙屋

又简称围屋。其主要特点是将建筑主体的后围建成半圆形,俗称“围龙”。一般为一条围龙,甚至有多达三四条围龙的大型围龙屋。这是粤东客家地区一种最普遍、最稳定、最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形式。较典型的围龙屋有兴宁宁中的“李和美”,梅县丙村“仁厚温公祠”等。

以上类型的传统民居,除了都有厅堂、天井、水塘、化胎等构成要素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在地理先生寻找的“风水宝地”上建造起来的,建筑的核心是将“龙穴”围起来,因而都可称为“围屋”。

因各地自然、社会环境各异,各种类型的民居建筑模式也是灵活多变的。如围龙屋的建筑模式,在各地又有不同类型。如在四点金后加上围龙,就成为四点金式围龙屋。据调查,兴宁市的围龙屋,就有7种不同的类型:①标准的半月形横堂式围龙屋,以宁新的“东升围”、“长兴围”,福兴的黄畿塘“大王屋”等为代表;②棋盘式走廊的围楼式围龙屋,以坭陂的“进士第”、“福公屋”等为代表;③四角带碉楼的城堡式围龙屋,以刁坊的“棣华围”、“黄宏昌”,新陂的李振球故

^① 邱国锋:《梅州市客家民居建筑的初步研究》,载《南方建筑》1995年第3期。



居、“馨梓围”，兴田的“凤翔围”等为代表；④“四点金”式围龙屋，以罗岗的“善述围”、“翼宁围”、“鸿吉围”等为代表；⑤杠式围龙屋，以福兴的“瑞征围”、宁中的“宝庆围”等为代表；⑥椭圆形围龙屋，以罗岗的“恒丰围”、黄陂的石氏中山公祠等为代表；⑦并蒂莲式围龙屋，以永和大成村张屋为代表。

客家民居类型多样，形态丰富，实际上是客家地区长期以来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层累”^①的结果。其中以围龙屋存世最多，分布最广，也最著名。因此，围龙屋成为客家传统民居的典型代表。

围龙屋的分布，以粤东梅州地区的梅县、兴宁为中心，向周边辐射，东南至丰顺县，东北至大埔、蕉岭及福建的平和、永定、上杭，西北至龙川、始兴、和平及江西寻乌、龙南等地，西南至五华、紫金、深圳等地，并随着客家人外迁，在广西、四川及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也有零星分布。据实地调查和初步统计，围龙屋集中分布面积约4万平方公里，现存数量在1万座以上，超过赣南围屋和闽西土楼的总和。

围龙屋是粤东客家地区一种最普遍、最稳定、最具特色的民居建筑形式，社会人文内涵相当丰富。住在围龙屋里的，均是讲客家话的客家人。因此围龙屋是一种具有族群性特质的传统民居。

二、客家传统民居发展变迁与社会性因素

客家传统民居是客家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缩影。客家先民定居南方山区，地潮多雨，湿瘴弥漫，将中原传统文化与当地环境相结合，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围龙屋、围楼、走马楼等各种很有特色的民居。

关于这些很有特色的客家民居的渊源，目前有两种观点，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是土生土长，另一种看法认为是东汉坞堡建筑的继承。土生土长观点的主要依据是与其他民族、民系相比

较客家民居的特殊性，而认为客家民居是在南方土著居民畲、瑶等的山寨基础上结合北方传统建筑模式和技艺而发展起来的。

（一）客家传统民居的发展变迁

经学者研究，客家民居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3个阶段。

1. 古寨。又称围寨，是南方人依山而建的传统民居，现在依然可以在西南民族地区见到。一般建在地势险要的山顶或山坡上，主要建筑材料为石头、木材、草皮等，主要功能是防范敌对势力的攻击。现存遗址有兴宁下堡镇的古寨遗址、丰顺县建桥镇的黄竹寨遗址等。

屈大均在300多年前从广州到永安县（即今紫金县）时，就见到了很多用草木盖的围寨。康熙二十六年（1687）七月，屈大均为修《永安县志》到紫金县时，一路所见，多是围寨：

“自归善水东，溯东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派。取轿历桥田、月角岭至义容屯，涉溪四五，夕宿宽清溪砦。次日历员墩、白溪，上岭者六七，涉溪十有三二，岭路逼仄，皆蛇盘……一路山谷间，皆茅屋，或一二家，或十余，二十余家，高者曰寨，平者曰围，或曰楼，或在山绝顶，或在隘口，一径微通，一夫可守。”^②

2. 围楼，即围屋、土楼阶段。其外墙厚达3~4尺，楼高2~6层，呈方形或圆形，采用全封闭式的防御结构。规模较大，设施齐全，实为一种城堡式建筑，依据自守的防御功能仍是其基本出发点。走马楼、四点金等，也属这种类型。

3. 围龙屋、府第式。这是一种大院式民居，多为一层的宽敞平房，是半封闭式结构，已不再显得压抑和局促，防卫性也不强，而表现了相对自由宽松、大家风范的色彩，体现了更多的生活气息。

当然，由于时代不同，社会环境复杂，各地自然环境不一，客家民居的发展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各种建筑类型并行不悖，之间并没有替代关系。但自清代至民国，围龙屋是粤东客家地区流

①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第52页。

② 屈大均：《入永安县记》，载《翁山文外集》卷1，第31页。民国吴兴刘氏刻嘉业堂丛刻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184册。

行的主要建筑模式。

据学者调查和研究,围龙屋源于宋,兴于明,盛于清至民国。目前调查所知最早的围龙屋,是南宋末年的梅县蔡蒙吉故居,以及元代的兴宁市东升围,比现在所见最老的土楼、围屋要早300年以上。现存围龙屋多为明清建筑,又以清代、民国建筑为多。如兴宁建于清代以前的围龙屋据统计现存有331座,不到总数的1/10。兴宁围龙屋的历史相当悠久。据当地文管部门普查,当地现存围龙屋中,建筑时间在400年以上的有331座,500年以上的有89座,其中建筑历史最长的是宁新街道东风村的东升围,该屋始建于南宋元年(1127),于元代至元十六年(1279)完全建成,始建时间距今已有883年,是历史上最早兴建的客家围龙屋之一。

(二) 民居变迁的社会性因素

客家传统围龙屋的发展,主要与以下因素有关:

1. 筑寨自保传统的继承,是围龙屋发展的现实基础。

自宋元以来,粤东地方动乱不断,而官府控制力量薄弱,居民有筑寨自保的传统。如五代末年兴宁城郊居民所筑之武婆城。而影响较大的还有大埔涂某所建之涂寨。据记载,宋末元初盐徒涂某从长汀迁至神泉(今茶阳)，“村于茶山下,筑城聚众,号曰涂寨。自称侍郎,据上杭、金丰、三饶、程乡之地,私征赋税。传弟涂侨,盘踞二十余年。”^①

至明代中叶以来,由于海倭山寇活动的频繁,粤闽赣交界地区一直动荡不安。粤东地方山寨之设相当普遍。据明代正德年间祝枝山所编《兴宁县志》记载,当时兴宁乡村筑有茅冈寨、英豪寨、和山寨等数十座寨堡。^②所谓寨堡,是村人选择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之处筑寨设堡,当贼匪来时,

即避入其中。修筑寨堡的目的,主要是出于自我防卫。“自贼起,乡人各自为寨,亦曰围。”^③至明末,兴宁县各乡围寨达数百,“阴城楼房,书不胜数。”^④长乐亦是如此,“寨之立,各乡俱有之。”^⑤围楼逐渐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居住方式。

而在邻近的永安县(今紫金县)亦是如此。明万历年间叶春及在编写《永安县志》时,叙述了当时永安县的乡村建筑情况:“自贼起,乡人各自为寨,亦曰围。委土可以为师保,故列于左:横冈围,火带岩前人居之;员冈围,乌石人居之;徯坑、杜田、樟田、鲤鱼头皆有围。营头围,黄花人所居也;安民围,林田一社人所居也;鹪鸪围,井塘人所居也;川龙、半江、庙坑人,皆居温子口围;上黄沙、大埔田人,则居得安围。……古名之寨三十,寃得之寨二十有六,琴江之寨二十有三,凡七十有九。”^⑥

寨堡经历了一个由山寨到围龙屋的发展过程。如原为山寨的兴宁张陂沥龙和围、冷井水龙和围、大龙田盘石围,至明末,据崇祯《兴宁县志》记载,“砖石砌墙,上覆以瓦,内存走马巷,俗呼为阴城。”^⑦即已从防卫性的山寨发展成为今天所见之围龙屋。围龙屋类似城堡一样的庞大建筑群,尤其是后面半圆形的围龙,应该是脱胎于传统的山寨。

至清代康熙初年社会稳定后,据康熙《兴宁县志》记载,“阴城楼房,书不胜数。”说明当时围龙屋分布已相当普遍了。

2. 宗族制度的发展,为围龙屋的建造奠定了社会基础。

自明代中叶嘉靖十五年(1536)官府允许祭祀始祖以来,以同姓聚居为特色的宗族村落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主要形式。宗族发展及其经济实力的增强,为建造庞大的围龙屋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源与经济基础。明代中叶以后,由于乡村新经济因素的萌芽,客家人除了从事传统的农业兼营

①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38,《征抚》,第6页。

② 祝枝山:正德《兴宁县志稿》卷2,《步寨》。

③ 叶春及:万历《永安县志》卷之一,《山川志第三》,第22~24页。

④ 王纶部:康熙《兴宁县志》。

⑤ 孙蕙:康熙《长乐县志》卷2,《建置》,第57页。

⑥ 叶春及:万历《永安县志》卷之一,《山川志第三》,第22~24页。

⑦ 刘熙祚:崇祯《兴宁县志》卷1,《地纪》,明崇祯十年刻本,《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44,第381~384页。



家庭手工业外,有部分人从事专门商业活动或外出以手工业谋生。不少宗族的经济实力也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因而有能力兴建像围龙屋这样的大型民居。围龙屋集家、祠于一体,住在围内的居民,都是同一个祖先传下的后裔,围内人相见,互以宗亲长幼相称。每一座围屋都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公共空间,这便是“祖堂”(或“祠堂”)。祖堂是围内居民的圣殿,位于建筑的中轴线上,这是人们举行重要礼仪活动的公共场所,也是维持宗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每年都要定时在此举行隆重的敬宗祭祖活动。围龙屋为宗族发展和族人聚居提供了“外壳”。

3. 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传统民居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传统以来,粤东客家山区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但在宋朝以前,此处还是一个“蛮烟瘴雨”之地。“长乐昏岚着地疑,程乡毒雾喷人腥。吾诗不是南征集,只合标题作瘴经。”^①这是宋朝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就任潮州知府路过梅州时所作的写实诗《入程乡界诗》,可见当时梅州还是尚待开发的深林密菁之地。至清朝中期以后,据《乾隆嘉应州志》记载,“今皆开辟,瘴雾全消,岭以北人,视为乐土。”^②无论是盆地还是山林,都获得了较为深入的开发,社会经济长足发展。尤其是工商业的发展,为民居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早期客家人恪守儒家重农轻商的传统思想,多务农,少经商,成为长期无法摆脱贫困状态的重要因素。如明朝正德年间知县祝枝山说当时兴宁人“不工不商,齐民率为疇畷,生用百货,咸资旅人”,因而“地狭民瘠”。康熙年间程乡县民也是“自服耕外无别业可治”,“固其民贫”。^③随着人地矛盾的激化和山区的开发,人们逐渐转变观念,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经营工商业于各地。如嘉庆《大埔县志》记当时的大埔县:“土田少,人竞经商,于吴、于越、于荆、于闽、于豫

章,各称赞本多寡,以争锱铢利益。至长治甲民名为贩川生者,则足迹几遍天下。”^④咸丰《兴宁县志》说当时的兴宁人,“商贾大列肆,小负贩终日营营,作客者多贸易于川、广、湖、湘间。”制烟、纺织等手工业相继兴起。清中叶以后,许多客家人还相率赴海外经营工商业。据1907年罗斧月所编《兴宁乡土志》统计,兴宁全县人口计37万余人,其中从事手工业者合计不下5万人,经商者在本境约2万人,在外境乃至外洋者约2万人。总计从事非农业劳动力,几占全县劳动力的一半。经营工商业,成为当时许多客家人的谋生方式。不少人以工商所得,盖起了大围龙屋。典型代表如兴宁刁坊黄宏昌四角围龙屋、梅县济济楼等。

据了解,梅州的客家围龙屋主要集中在兴宁、梅县和五华,而兴宁因工商业发达,又是其中数量最多且最密集的地区。据2009年普查,兴宁现存较好的围龙屋共有3041座。兴宁围龙屋不但数量多,而且很密集。据卫星电子地图显示,在宁江平原7个地方合计24.08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共有围龙屋342座,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14.21座。其中福兴街道神光山前2.53平方公里范围内就有52座围龙屋,宁中镇李和美屋附近2.53平方公里就有44座围龙屋。^⑤

4. 文教的兴盛,为围龙屋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传统集权社会,居室成为一个人表示其贵贱尊卑社会地位的标志。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居室的建筑规模和样式,须与屋主的身份相符,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要受到政府制裁。早在西汉初,贾谊就论述说:“高下异,……则宫室异,则床席异,则器皿异”。^⑥因此,对于官民百姓的房舍制度,历代有严格的规定,如果不遵循,就要受到严惩。如明代统治者为维护礼法和等级制度,制定了一整套严格的住宅等级规划。《明会典》规定:“公侯造屋,七间九架;一品、二品,五间九

① 杨万里:《诚斋集》卷17,四库全书本。

② 王之正:《乾隆嘉应州志》卷1,《风俗》。

③ 刘广聪:康熙《程乡县志》卷1,《风俗》。

④ 蔺琦:嘉庆《大埔县志》卷10,《风土志》。

⑤ 宋健军等:《兴宁:客家围龙屋“博物馆”》,载《梅州日报》2010年6月13日。

⑥ 贾谊:《新书》卷1,四库全书本。

架；三品至五品，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三间九架；庶民所居房舍，不过三间五架。”《大明律》特设专条，对越级僭用房舍者严加惩处，“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工匠并笞五十”。

在客家地区，崇尚文化，重视教育，以兴学为乐，以读书为本，成为一种社会风气，不少客家地区是有名的“文化之乡”，这是客家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当然，这种习俗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客家地区的文教兴起于宋代，发展于明代，至清初以后相当兴盛，成为岭南著名的“人文秀区”。^①

宋代的客家地区，虽为正在开发的蛮貊之地，但由于官府对教育的重视和提倡，在梅州等地设立学宫，文化教育开始兴起，并逐渐形成读书的风气。如南宋人王象之所编《輿地纪胜》载：“梅人无产植，恃以为活者，读书一事耳。”^②说明当时很多人以读书为业。至南宋宝祐元年（1253）福建莆田人侯安国来梅讲学时，“弦诵之声，不绝里巷”，文风兴盛。门生蔡蒙吉12岁“应童子科，登进士”，这在岭南是少有的事。

明代以来，客家地区的文教发展迅速，其中以梅州最为突出。程乡县“文风极盛，每科乡会中式，通省各产，罕出其右”，成为清朝雍正十一年以程乡县为基础设立嘉应州的理由之一。至乾隆初年，一州之中“应童子试者至万有余人”。^③其时嘉应州总人口不过100万人左右，考秀才的人占到总人口数的1%左右，比例之高，全国罕见。从科举成就来看，清代梅州出现了“五科连解”（即在广东乡试中接连五科的第一名都是嘉应州人）^④、“一科五进士”、“父子四进士”、“三代三翰院”、“一腹三翰院”等盛况。据统计，在清朝近300年间，仅嘉应直隶州本州（即今梅县）就考取举人621名、进士89名；大埔县考取进士42人，举人247人，远远超过全国各县的平均数。

文教的兴盛，使梅州很多人获得了功名，不少人还外出为官，成为品官之家。很多人便以官职的品级，建起了相应规格的府第式的围龙屋。

而且围龙屋的厅堂和横屋，本身就是府第式结构。不少围龙屋被命名为“大夫第”、“进士第”、“太史第”，就是这种规制的反映。现所见宋朝进士蔡蒙吉的故居，就是一座府第式的围龙屋。

5. 近代客家华侨的大量出现，促进了围龙屋的兴盛。

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多地少生存资源短缺，至清代中叶，尤其是清末鸦片战争失败，沿海对外开放后，大量客家人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南洋地区以及美洲、欧洲等地谋生，遍及五大洲8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家华人华侨以梅州最多，“有海外客家半梅州”之称。据统计，在海外的梅州籍客家人现约有300万。其中以梅县、大埔、丰顺最多，其次是兴宁、五华、蕉岭、平远等。

梅州侨乡形成于19世纪末，其巩固和发展则在20世纪初以后。海外华侨将客家人刻苦耐劳、艰苦拼搏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与侨居地人民和睦相处，胼手胝足，共同创业，在为当地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同时，也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其中有些成为富商大贾。在外事业有成的华侨都按客家人落叶归根的传统，回到家乡买田买地做大屋，光宗耀祖，改善家人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在侨乡不论平原、丘陵，侨眷都普遍修建、扩建、新建数量不等的房舍。从而在侨乡地区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客家建筑群落，并且历经百年沧桑仍保存完好，这些建筑群是当年侨乡村华侨辉煌创业史的见证。有的侨眷建房之大、数量之多、标准之高令人赞叹。建房最大的是南口侨乡村潘氏家族的大围屋，占地约40亩。建房最多的是隆文本寨的华侨肖郁斋，先后建起5座房屋，共219间。白宫富良村的联芳楼，耗资18万大洋，于1934年建成，为中西结合的两层楼房。

在梅县南口镇侨乡村，这个依鹿湖山脚透迤而建的小山村风景秀丽，是著名的华侨之乡。该村所辖的寺前排村、高田村和塘肚村三个自然村，有四百多户人家。据统计，从光绪末年到1940年

① 肖文评：《论清代梅州“人文秀区”的形成》，《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8期。

② 王象之：《輿地纪胜》卷102，《广南东路·梅州景物记下》。四库存目丛书本。

③ 王之正：乾隆《嘉应州志》卷1，《风俗》。

④ 梁伯聪：《梅县风土二百咏》，载《梅州客家风俗》，暨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代的几十年中，华侨 1.5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共盖了 31 座围龙屋，占了全村围龙屋总数的 60%。据介绍，从这些建筑的名字中就能看出该村华侨当年在世界各地分布的范围之广：“南华庐”、“南华又庐”是主人在南洋赚了钱后回来建的，“东华庐”的主人是在东洋（日本）发的财，“美华庐”的主人则是美洲华侨。据有关专家论证，认为侨乡村的客家围屋建筑群是目前我国客家地区发现的“中国最典型的围屋古村落”。^①

在梅州随处可见的各种西洋风格的华侨建筑围龙屋、府第式、五凤楼等，虽历经近百年，仍不失风采。

三、社会影响和意义

客家传统民居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国优良传统，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和意义。

（一）传统礼制的“活化石”

《礼记》云：“夫礼者，卜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古代礼制的核心是宗法制度。宗法之宗字上从“宀”，屋顶形，下从“示”，神主也，凡有神主的地方即为宗庙。宗法即宗庙之法。围龙屋正是民居与宗庙的结合，上堂即为祖公堂，是最神圣的地方。因而，聚族而居的客家围屋，从形式到内容，综合起来就成为古代礼制的“活化石”。

在各种类型的客家围屋的祖公堂中，有雕刻精致的神龛，按“左昭右穆”的顺序陈列着列祖列宗的牌位，不得错乱。逢年过节，居民要在此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祭品有“三牲”（猪肉、鱼、鸡）、各式糕点和水果等，子孙们穿戴整齐，烧香、点烛、读祭文、行跪拜礼。门口贴对联，放鞭炮。正月十五日元宵节，新生男丁要到祖公堂“上灯”（挂灯笼）。正如《礼记》所云：“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至今还活生生地体现在客家围屋的节日祭祀活动中。

在围龙屋内所举行的婚、丧等活动，同样遵循古代礼制的传统。传统社会客家人结婚，大都按《仪礼·婚礼》行事，邀请媒人婆，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六礼”。迎亲用锣鼓、音乐、花轿和盖头（罗帕）等，均与中原无异。新娘进大门到上堂拜堂，也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然后才入洞房，这也是中原的风俗。

聚族而居的客家人，一个围屋内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上千人，每逢岁时节日或红白好事活动热闹非凡，同样继承中原传统。如春节祭祖拜年、舞龙舞狮，元宵放灯，清明扫墓，端午吃粽子、划龙舟，中秋赏月吃月饼，九九重阳登高，冬至吃汤丸等。它既有中原汉族节日文化的共性，又有客家节日文化的个性。

围龙屋结构主次分明，屋内住户按辈分高低及尊卑来分配房间，其中正堂处于正中，一般由族长或辈分最高的人来居住，体现了儒家长幼尊卑的观念。

围绕着围龙屋开展的各种民俗文化活动，都可见源远流长的传统礼制遗风。

（二）儒家思想的反映

围龙屋不仅是适应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人们为生产、生活和繁衍的需要而建设起来的居住地，同时也是保留传统文化的宝库。自西汉王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中央王朝和中原汉人的正统思想，“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写照。走进客家围屋，到处都充满儒家思想文化的气息。

“耕读为本”，“学而优则仕”，是以往客家人思想和行动的准则。许多围屋的大门口或祠堂前都竖有石笔（梅县俗称“旗杆夹”），上面刻有“大清 XX 年 XX 科进士”等。在祖公堂上，则有“进士”、“魁元”等牌匾。这些都是张扬本姓氏家族有人取得某种功名的标志，引导和鼓励子孙为“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而奋斗。所以，客家地区到处流行“蟾蜍罗，咯咯咯，唔（不）读书，冇（无）老婆”的童谣，自小就教育小孩要努力读书。

围屋内的堂联，凝聚着客家文化的精华，是

^① 《“中国最典型围屋古村落”藏身侨乡村》，载《梅州日报》2007年8月3日。

一种让子孙随时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宣传标语，创造出一种立身处世的文化氛围。这些堂联内容广泛，主要有追根溯源，寻根问祖；或显扬祖德，激励后生；或艰苦创业，勤俭持家；或爱国爱家，报效祖国，等等。特别突出勤俭、孝悌和读书为本的精神。如兴宁黄陂镇石氏恭创围堂联：“莫谓锦堂真富贵男畏耕女畏织怠惰终需落下品；勿云茅屋无公卿士劳心农劳力殷勤必定出人才。”兴宁新镇大圳罗氏四角楼祖堂联：“家声不坠唯端品；壮志欲酬必读书。”

综观围龙屋内的文字，中原华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贯穿始终，这是客家人对中原汉族文化认同的重要标志。

（三）“天人合一”宇宙观的物化

围龙屋整体浑如鸡蛋的椭圆形，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中国古人常以图形符号代表抽象概念，三国时徐整《三五历纪》说：“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后乃有三皇”。鸡蛋形是天地未分时的宇宙混沌意象，隐含着宇宙、天地、阴阳、道、本源等基本概念，同时还隐含着从无到有、天地创生的宇宙起源论，因此蛋形是中国古人的宇宙图式，象征着天地、天道。围龙屋的椭圆形就体现了这种观念。围龙屋前的水塘象征阴，化胎代表山，象征阳，两者同时又可象征天和地。如把前后两个半圆合成一个圆圈，一阴一阳前后相合，正好构成一个形如双鱼的太极图。在这个太极图内，山水和合，阴阳回旋，给人阴阳相生、乾坤玄化之感。而且水塘和化胎正环抱着中间的人居，构成天、人、地相合的宇宙图景。化胎下有序地排列着形状不同的5块石头，甚至刻上“水、火、金、木、土”五个字，俗称“五星石伯公”，分别代表着水、火、金、木、土五行，而这五行，正是古人认为构成宇宙的五种元素。围龙屋拥有这五行，也就拥有了与大千世界相一致的结构要素与结构和谐。最近在兴宁发现清代刻在阴阳两仪五行八卦图上的围龙屋建筑图纸，就是实证。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围龙屋的椭圆形是道、是一，一生二即水池、化胎，代表着阴阳，

二生三即水池、化胎、人居，代表着天、地、人，三生万物即五行。围龙屋巧纳道（一）、阴阳（二）、天地人（三）、五行（万物）于一屋，客观上是顺天象天的宗教行为，表现了人的自然化观念，主观上则表达了自然的人化观念，体现人道与天道的协调统一。

（四）传统农业经济的基地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长期以来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每个围龙屋，就是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体系。各家拥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而大牲口和大农具在围屋内可以互相租借。大门口有共同晒谷的禾坪和养鱼的池塘，围屋内还有共同使用的水井，有可以共同使用的谷物加工工具——风车、舂、碓、磨等，甚至还有榨油和榨糖的大型工具。围内或围屋旁边建有厕所、猪圈，等等。有些围屋内还建有学校。从生产、生活到文化教育，围屋设施齐全，完全是一幅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活图景。这是围龙屋赖以长期存在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五）人与自然和谐的杰作

传统围龙屋建筑特别注意与周围自然环境的协调。建筑本身就是一个供人们居住、工作、娱乐、社交等活动的环境，因此不仅内部各组成部分要考虑配合与协调，而且特别注意与周围大自然环境的协调。围龙屋的设计者们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周围的山川形势、地理特点、气候条件、林木植被等，都认真调查研究，务使建筑布局、形式、色调等跟周围的环境相适应，从而构成一个大的环境空间。

围龙屋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完美结合，人工融合自然，不仅创造了理想的生态环境，也给人以美景天成的感觉，创造了“虽由人作，犹如天开”的佳境，充分体现了建筑与自然的和谐之美。围屋建筑材料多为土、砖、石、木材，墙脚为块石干砌，外墙为夯土墙或泥砖，木材多用于屋架门窗，屋顶采用散热快的瓦片在屋顶重叠，以达到遮风挡雨、躲避阳光的功能。这些材料就地取材，自然、透气性好，对人体和周围环境都不会产生危害，从而创造了与自然融合的原生态环境。

客家地区的村落或房屋，选址非常讲究，主



要选在靠山、近水和向阳的地方，负阴抱阳，前有平坦耕地，中间或周围有潺潺溪流。如大埔县张弼士所建的光禄第，其正面是宽广的田畴，后面是小河环绕，小河背后是一座青翠的大山，占尽了良田和山水的地利。围屋一般坐北朝南，冬暖夏凉。高低屋顶与山势呼应，围屋屋顶构成的线条与一些现代建筑顶部的流线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客家人对山和水情有独钟，于是乎本是穷山恶水，也被改造为或被视为青山绿水加以歌颂。如焦岭县淡定村丘逢甲故居“培远堂”楹联：“西枕庐峰东朝玉笔山水本多情耕读渔樵俱适意；南腾天马北渡仙桥林泉皆胜境同藏出处尽随心。”兴宁罗岗镇袁氏善述围大门柱联：“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这些对联是客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集中表现，体现了客家人喜好山水、热爱自然、胸怀壮志、乐观豁达的高尚情操。

四、结语

粤东客家地区现存土楼、走马楼、围龙屋、府第式、中西合璧式各种民居建筑形式，是当地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文化发展在建筑上的直观反映，是当地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见证，体现了粤东地域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过程，是一部活着的历史。

其中以围龙屋最具特色，体现的文化底蕴最为深厚。

围龙屋建筑规模宏大，综合了土著山寨、中原府第式等各种建筑形态，融合了各种社会文化传统，集传统礼制、伦理观念、阴阳五行、建筑艺术于一体，讲究天人合一，是客家历史文化的—个缩影，堪称世界建筑—绝。

以围龙屋为代表的客家传统民居，是历代客家人创造、发展和传承客家文化的基地，是客家人和客家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基石，是海内外客家人的心灵家园。因此，颇具特色的客家传统民居，是历代客家人留给世人的宝贵文化遗产。保护客家传统民居，吸收客家民居建筑的合理元素，传承客家传统民居文化，对于传承和发展客家文化，对于促进客家地区社会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梅州市委市政府自从提出“文化梅州”发展战略、打造“世界客都”品牌以来，地方各级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对客家传统民居进行保护。其中影响最大者，国家文化部2010年5月批准梅州市为“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保护客家传统民居提供了政策依据。以客家围龙屋为主题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也已经启动。相信千百年来伴随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发展起来的围龙屋等传统客家民居，仍有着灿烂的明天。



ISBN 978-7-218-08493-0



9 787218 084930 >

定价：48.00元